

太昊伏羲作为中华民族始祖、文化的肇始者，被奉为“三皇之首”、“百王之先”，他“定姓氏，制嫁娶”“教人网罟”“有圣德”，对华夏文明的延续发展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。因此历史地位十分显赫。在对他记事彰功的有关文献中，古人对他有不同的称谓，再通过文字上的同音相代，其称谓就更是繁多，有人读到 he 不同的称谓甚至不知道都是指太昊伏羲。本文现就古今对其较常用的加以辨析考证，把笔者发现的称谓列一“清单”。

《纲鉴易知录》说人祖“有圣德，像日月之明，故曰太昊”。太，意为极大；昊，从“日”从“天”，指浩宇中日之光辉。古文中“昊”往往又是“昊天”之省。《诗·小雅》有“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”也有“有北不受，投界有昊”。这里“有昊”的“昊”，就是“昊天”之省。人祖太昊这光明磊落浩然博大之称谓，和他对远古社会的贡献是分不开的。

古人写文章或抄书多用通假。即用音同或音近的字代替，相当于现在的写别字。古文献中对“昊”多有通假之处。

皓，又通作昊；皓，天也。在《荀子·赋篇》中，后人给“皓天不复”句作的注就是“皓同昊”。在《楚辞·远游》“历太皓以左转”句的注中，也说“皓即太皞也”。《后汉书·朗凯传》“陛下若欲除灾祉，顺天致和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，乃加斥黜，以安黎元，则太皓悦和，雷声乃发。”这里的“太皓”就是“太昊”。

“昊”与“皞”也相通，故“太昊”又写作“太皞”。《礼·月令》有“其帝太皞，其神句芒（人名，太昊重用的木正之职）”之语，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“皞”字左旁从日，是左形右声，在唐代三石刻经上，现在还可以看到这个字的左旁是“日”。至于后来变“日”为“白”，是将错就错使然。

北宋刘恕著《通鉴外纪》一书说“太

# 人祖称谓考

李郁

昊始作网罟，以佃以渔，以赡民用，故曰伏羲氏。”从这段文字上可以看出，“伏羲”是太昊的另一个称谓。《说文解字》：伏，司也；羲，气也。太昊、伏羲从意上说有内在联系。

因通假，“伏羲”在古文献中也有“宓羲”“宓戏”“伏戏”等多种称谓。

战国时代荀子著有《成相篇》，在抒发他的治理天下理想时说“基必施，辩贤要，文武之道同伏戏”，文武，指周文王和周武王，而伏戏即伏羲。

太昊、伏羲连称最早见于《世本》，书中有“太昊伏羲氏，东方木德之帝也。”据此，可知伏羲即太昊伏羲。《世本》是西周至战国期间由史官相继而成的著作，主要记载帝王、诸侯姓、氏和世系。这说明“太昊伏羲”连称至少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了。

汉朝的毛亨为《诗经》中的《陈风》作传，特提到太昊，“陈者，太皞惠戏氏之墟也”，又写道“惠戏即伏羲，字异音义同也”。把话说得很明白。

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作“太帝宓羲氏”。《礼·月令》注“大宓羲氏”，必在这里读作“伏”。古有“宓”姓，如春秋的鲁国有为孔子所称道的贤者“宓不齐”。

“宓”字上边的“宀”，是指“场所”；“宓”的本义指“心脏真实存在但不可看见”，转义为“隐藏”。“宀”与“宓”以上下结构的形成结构，表示是“隐藏的处所”。而“伏”字从人从犬，意为“人像狗那样趴着”，再引申为“隐藏自身”。故“宓羲”“伏羲”都有隐藏的意思。“宓”与

“伏”是近义词，读音相同，字意相近，自然也就可以相互代替了。所以“伏羲”又作“宓羲”。

到了南北朝，北齐学者颜之推对“宓”“伏”二字严加考证，认为二字不是通假，而“宓”是“虑”之讹，是在传抄中误写了，应该是“虑羲”。他把他的论证和结论写入《颜氏家训·书证》中，并渐为社会所认可，南北朝之后很少再有人将“伏羲”写成“宓羲”或“宓戏”了。但这也说明了“虑”字，在古代也有和“伏”相同的读音。

人祖的另一个称谓是“庖牺”，《纲鉴易知录》：太昊“养牺牲，以充庖厨，故又称庖牺氏”。牺，指纯一色的家畜；牲，指用来祭祀而宰用的猪、牛、羊；庖，屠宰之处；牺，烹饪之所。这说明当时社会已由单纯打猎过渡到饲养，并有了屠宰场所，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和改善。这一切太昊功不可没，故又曰“庖牺氏”。这一称谓，这已有很强的纪念意义了。

因“庖”“包”二字音近，因通假，故“庖牺”又写成“包牺”。《易·系辞下》“古者包牺氏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伏则观法于地”。

庖牺，在古文献中也写作“炮牺”。如《汉书·律历志下》：“《易》曰：‘炮牺继天而王，为百王先，首德始于牛，故为帝太昊，作网罟以田渔，取牺牲，故天下号曰炮牺氏。’”

按说人祖称谓“伏羲”与“庖牺”不应交叉，但由于羲、牺音同，也有参错而称的。清朝的谢逢源在他的《龙川夫子

# 周家口商贸经营中的监督文化

王爱民

周家口从明朝末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荒村野渡，一举成为中原一大商埠、河南四大名镇之一，其间商贸繁荣达 400 多年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渐完善而又发扬光大的经营理念、监督文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

周家口商人的经营理念，主要是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，关羽神威文化现象的信仰仰鉴、经商活动的必然要求、商人自身价值目标追求的动力等多种因素的冶合力作用，而逐渐形成和丰满起来的。其中周家口商人在中国古代儒、道、杂诸家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强有力的监督文化，对这种经营思想起到了催化作用。而且无孔不入、无处不在。奉行儒贾相通、义利相融、诚信戒欺、和衷为贵、勤俭为本的道德原则，竭力实践行业之间、人与人之间言必有礼、行必有益、取财有道、中和以德、慎待相与等一整套行为规范。

**一、利用经商谚语监督，让诚实守信成为商人的自觉行为**

经商谚语是最好的监督文化。周家口商人认为诚信是经商之本，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要素。在商场，盈利是靠商品的质量、信誉和商家的服务取得，一旦信誉丧失，必然招致商业失败。因此周家口商人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，总结出许多有关诚信经商的谚语，如“宁叫赔折腰，不让客吃亏”；“售货无诀窍，信誉第一条”；“货真价实，秤准尺满”；“先义后利，文字当先”；“诚召天下客，义纳八方财”、“买卖不成仁义在”等。既是商人们为人处世的座右铭，也是商

客之所想，帮顾客之所需，与人方便与自己方便。在给客户提供最大服务的同时，也为自己赚取不薄的利润。周家口明清时期是豫东最大的粮食交易市场，往来客商遍布全国。贸易范围，北达长城内外，南至闽浙湖广。商行热情为顾客户服务，尽量为顾客排忧解难。比如代客买粮，严格按照客人的要求，保证粮食质量数量。对顾客购买的粮食，一时不能转卖需要在周家口暂时贮存保管的，无论租赁仓房、盘斗搬运，统由行店负责代理，保证无误，无需客人操心。出仓时，粮食一旦出现短缺耗损，无论耗损多少，统有行店如数赔偿损失；有了多余，不管多余多少，统归买主所有。因此，各路客商对周家口的粮行都非常信赖，愿来周家口采购粮食。粮坊对卖粮客的服务与照顾也特别周到。对带粮少不值得粮行收购的，粮坊便随行就市给予收下；有的卖客当时嫌粮价不好，暂不出售的，粮坊可免费负责寄存，等行市相宜时再卖；也有的将大批粮食存入粮坊，慢慢零星取钱使用等待时机。这些粮坊不但都能提供便利，并且在粮食数量、出售价格各方面绝对严守信用，一丝不苟，因而四方远近的卖主和贩粮客商，都乐意到周家口交易。这就保证了周家口市场的粮食品种齐全，货源充足，价格合理，销路畅通。这也是周家口粮食市场长盛不衰的最重要原因。

仰望头上的星空，遵守心中的道德，是周家口商人固守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周家口商人商业活动的效果，经受着社会实践的检验，这就决定了经商的

年谱》中说“包羲，天子也；文王，诸侯也；孔子，陪臣也；太谷，庶人也。”

另外除了正规的称谓外，太昊伏羲还有自己的别号。如东晋王嘉在他的《拾遗记》中说：“春皇者，庖牺之别号。”

朱窑基总理曾为淮阳题词：“羲皇故都”。太昊伏羲为什么要称“皇”？这和古文献中的“三皇五帝”有关。传说中的三皇有三种说法：伏羲、神农、黄帝；伏羲、神农、祝融；伏羲、女娲、神农。三说皆以伏羲为首，所以世称伏羲为“三王首”。古文献中也多有称伏羲为皇之处。如曹植的《汉二祖优劣论》中有“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”。

伏羲不仅是三皇之首，同时也是五帝之尊。五帝是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。古人对帝的解释是“帝者，王天下之号也”，也就是说在天下为王的入可称之为帝。伏羲曾“王天下”“作都于宛丘”，以帝称之是理所当然。

伏羲称皇帝称，为什么带要称氏呢？其实太昊伏羲氏的“氏”和姓氏的氏无关，因为伏羲是风姓，他生活的时代“氏”文化还没出现，“氏”比“姓”的出现要比伏羲生活的时代晚得多，所以伏羲生前不可能以“氏”相称的。这是古人在文献中对伏羲的一种特殊的尊称。

三代以前的帝王因事迹无文字可考，多是口口相传。古人根据历史上口传人物事迹，对于社会发展有巨大贡献的人都加“氏”以表尊崇。如神农氏、燧人氏……最后称氏的帝王是舜——有虞氏。

对人祖的称谓不仅不同书中称法相异，就是在一篇文章里称谓不统一的也不少。如《庄子》一书中，有四处关于人祖的记载，其称谓就有“伏羲”“伏羲”“伏戏”三种。

至于称伏羲为“人祖”“人祖爷”，在古文献中难以见到。但是，却在民间村妇田夫口中广为流传，而又约定俗成。

道德实践行为要符合社会上人们的道德评价要求，受到社会实践的规范。周家口三泰成杂货店从 1800 年开始创办，到 2010 年停业，前后经历了 200 多年，其几代东家已无从验证，多少名掌柜更无人知晓，唯有百年不倒的招牌令人神往。三泰成所处的位置，就在原周家口的新街南十字街口。清代，这里是周家口历史上最古老的商业中心街，店铺林立，白天车水马龙，夜晚灯火辉煌。糕点月饼是三泰成的拳头产品，享誉周家口十里八乡。百年老店的经营之道就是诚信为本。三泰成信奉“和气生财、童叟无欺”，生客、熟客同等对待，价格、斤两不准虚假。三泰成的掌柜常教育员工：“看着钱近是钱远，看着钱远是钱近，”就是说不能只顾眼前利益，要考虑长远利益。道理很浅显，却充满了辩证法。正因为有如此良好的经营理念和商业道德，才使得“三泰成”信誉远扬，财源茂盛。有一年的中秋节，月饼非常畅销。有一批月饼做好后用秤秤时，却发现一斤的月饼少了一两。按说顾客一般买回月饼后是不会自称一称的，况且又比较抢手。但三泰成的掌柜却不这么想。他说：“不要以为神不知、鬼不觉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诚信比金钱重要。不能让顾客吃亏。耍小聪明，自欺欺人，看似赚些蝇头小利，其实是砸自己的招牌。”他告知顾客，这批月饼少了一两，便宜卖，减价百分之三十。这次月饼事件，虽然商号蒙受不少损失，但信誉昭著，近悦往来，商号更加繁荣。（上）

# 袁世凯与近代朝鲜

范闾杰

到中国请朱元璋钦定。朱元璋亲自选定，以“朝鲜”为其国号。为方便与“箕子朝鲜”的区别，史称其为“李氏朝鲜”。李成桂的朝鲜和朱元璋的大明，从此建立起明确且亲密的藩属关系。这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“事大主义”外交政策。

“事大”一词，语出《孟子·梁惠王》，原文为：齐宣王问：“交邻国有道乎？”孟子说：“有。仁者能以大事小，…惟智者能以小事大，…（仁者）保天下，（智者）保其国。”所以，“事大主义”说白了就是：大国宽仁，靠自己的实力和信誉，保护小国，承平天下；小国智慧，尽心侍奉大国，保有社稷，安邦定国。

东北的女真部落崛起后，满洲皇帝皇太极统帅十二万大军发动了对朝鲜的战争，一举将朝鲜国王仁祖困于南汉山城。仁祖无计可施，被迫在三田渡（今首尔松坡区三田渡）向皇太极投降乞和，史称三田渡议和。这样朝鲜在明朝尚未亡之前，已成为大清的附属国。

朝鲜李氏王朝之所以能够跨越中国明、清两代，绵延不绝地立国五百多年，并非因为强盛，而是与其成功奉行“事大主义”政策分不开的。首先，明、清两朝的中国政府都能严格恪守“事大主义”原则，对弱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，对众多的藩属不存扩张吞并贪欲，这种“宽仁”的大国情怀正是“事大主义”在中朝之间始终如一贯彻不移的基本前提；其次，明、清两代中国政府都对朝鲜政府极尽卵翼之责，这也是朝鲜政府无论国运强盛，还是国力衰败，但都能外御强敌，内安变乱，



## 寿命仅仅几十年的牲口屋

王天瑞

说公社、说大队、说生产队，不能不说生产队的牲口屋。牲口屋，又叫社屋。它是那个时代派生出来的一种形式、一种事物、一种传奇、一种发明。它在那个时代的大染缸里染上了那个时代的浓浓色彩。

轰轰烈烈、轰轰烈隆……跟随“人民公社好”的伟大指令，农民们入了社，成了人民公社社员；土地入了社，小片连成了大片；耕畜、农具入了社，这样，牛、驴、马、骡……杈、耙、扫帚、扬场锨……石碾、磨石、赶牛鞭……它们额头上就刻上了千百年来独有的红火、滚烫、灼人的“公”字符号。于是，牲口屋诞生了。

黄村生产队的牲口屋，从外表看，很气派、很威武、很壮观。刚刚入社的社员们，恨不得把一颗心掏出来献给人民公社。听说生产队要建牲口屋，无不顾其所有，任不吃、不喝、不用，也要捐献出手中的钱，也要捐献出家中的砖、瓦、梁、檩、椽、椽……

黄村生产队的牲口屋，是一拉一溜的青砖蓝瓦屋，坐北朝南，一共九间。这屋子很“野”，这一间屋可比民居的一间要长得多、宽得多、大得多。西头的三间是农具库，东头的三间是粮食仓，中间的三间是饲养室。饲养室的东间，喂快牲口——驴、马、骡；西间，喂慢牲口——老黄牛。饲养室的中间，南半边是空地——可供人们自由活动；北半边是草窝——把提前铡细的麦草储存草窝里，随用随搬，喂牲口方便。饲养室东间与西间的两排牲口槽，相对着。进门两边的靠墙处，摆两个腰高的淘草缸。室内从檩子上吊下一个玻璃罩子大马灯，饲养员为保证灯光明亮，每天都要擦一遍。你可别小看这个饲养室，从内部看，简单又土气，甚至土气得掉渣，它却是全队的文化活动中心哩！

喂牲口，是个操心、细致、辛苦的活儿。因为牲口不会用嘴巴“说话”，也不会用肢体“表达”，这就要求饲养员必须具有与牲口交“朋友”的高度责任心。平时，既要善于观察牲口的“心情”，又要千方百计满足牲口的“需求”。饲养员喂牲口时，要把麦草淘洗干净，要把牲口搅拌均匀，要让牲口适时饮水——俗话说“饮牲口”，要保证牲口吃饱喝足，要经常给牲口挠痒、梳毛，要定期给快牲口打蹄子——切除蹄板下的老茧，要谨防牲口互相抵头、咬架、蹄蹬、攻击。农谚常说，马无夜草不肥。饲养员每夜都要给快牲口喂一次草料。于是，那个玻璃罩子大马灯，也就轰轰烈烈地不知疲倦地夜夜常明。

牲口屋的大院子里，栽着几排木



国文化交融源远流长的明证。

韩国今天正在使用的国旗就是草创于这一时期。“云扬号”事件后，朴泳孝、金玉均奉命率使团出使日本。当时，出海轮船悬挂国旗，以利辨别国籍的作法已经通行各国，且使团展挂自己国旗亦是一种惯例，金玉均等人便申请使用大清国龙旗作为使团出使国旗。李鸿章认为朝鲜使团悬挂大清龙旗出使，可以在国际活动中彰显两国宗藩关系，同意金玉均等人的请求。但报告打到总理衙门，却被否决了，因为那里的官僚更在乎陈腐的等级和虚幻的面子，坚持认为藩国不能使用五爪龙旗，而只能使用四爪龙图案。本就对清国不存好感的朴泳孝、金玉均等人，认为四爪龙旗是对朝鲜国的歧视，最终朝鲜政府以“红龙青云制造须费工”为由，拒绝了马建忠使用四爪龙图案做国旗的建议。当时马建忠在朝鲜帮助处理外交事务，他便改而建议朴泳孝、金玉均使用太极图作为国旗，再在周边配以八卦符号，以便和日本国旗区别，朴泳孝、金玉均表示同意。1882年9月22日，朝鲜使团乘坐“明治丸”号轮船前往日本，英国驻朝鲜领事阿须敦同行，朴泳孝、金玉均根据阿须敦和英籍船长杰姆士的意见，将八卦图案减少四个，只保留乾、坤、坎、离四卦置于旗帜的四角，朝鲜最早的太极旗初步定型。

1883年3月6日，朝鲜王朝正式以太极旗为国旗，并咨报北洋大臣李鸿章。中日甲午战争后，李熙建立大韩帝国，太极旗成为帝国国旗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注：《朝鲜近代史》曹中屏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第1~2页

周口名人